

学林

← (上接7版)

年、成仿吾生于1897年、朱湘生于1904年。

这群人里除了郭沫若年纪稍长，都属于1895—1905世代。这一世代的成员未尝到过科举废除的痛苦，同时也没机会搭上清末新政的顺风车。辛亥革命对他们来说则只是一场小部分人浅尝辄止的“挂招牌式革命”。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能充分感受到的是新文化的席卷，民国政治的污浊、“学阀”实际的和想象中的压迫以及身为“高等游民”的无奈，这些汇集而成的是强烈的代际超越的冲动。这以胡梦华在评价“梁胡蔡陈”时的一段话即为典型：

梁蔡胡陈诸氏，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新青年》二三杂志，不足以代表现在的新文化运动了。而《学衡》记者偏根据梁蔡胡陈诸氏，《新青年》、《小说月报》来批评现在的新文化运动，不过益形现出他们的“诬”呵！

这段话明显表露出卢前等人并不是站在《学衡》的立场上来反对新文化，而是希望能由他们来主导“现在的新文化运动”。正因为学生是“以己新批彼新”，同时也不太能容纳“旧”。所以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与作为老师辈的东南诸教授有较大区别。而区别就在张灏说的，对传统究竟是处于一个“外部观察”的状态还是一个“参与其中”的状态。对于东南诸教授来说，他们很多是“参与其中”的人，对传统有活生生的体认。像胡先骕与他诸位老师接触就能充分感知传统：沈曾植是“虽任冲繁之首府巨任，实乃澹然儒者”；夏震武谒圣时“必岸然立于中位，幼云先生（按，刘廷琛，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）亦听之而侍立其侧，不以为忤”；对林纾，胡氏更是说其为老师中“最令人怀念者”，因为“先生之语言妙天下，虽所讲授者为宋明学案，而以其丰富之人生经验以相印证；又繁征博引古今故事以为譬解，使人时发深省，而能体认昔贤之明训”。

但卢前这一代大概就因隔了稍远而不太能“参与其中”，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以一种冷静和峭刻的方式从外部观察传统。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《燃犀》中特别要写林纾在路上捡女鞋事：

有一天，他老（按，林纾）正在十丈京尘的道上闲走着，忽地里前面一辆车子如飞地跑过去，定睛看时，不偏不倚的正落了一件东西在他老前面，红通通的，又有些香扑扑地。他老拾起来，在鼻子嗅了几下；向怀里

抱好了，不多时那车子又如飞地折回来，车上坐的一位美人，袅袅婷婷的向他老招呼：

“老伯伯，您老人家看见一只红鞋子落下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什么红鞋子！没看见！没看见！”

他老先生急的脸红红地回答她，暗地里觑她那副娇态，那女子听了没法子，只好低下头来，叫车子慢慢地向前一路找去。他老于是回到家中。从此书斋里，又多了一样清贡品。

这段充满恶趣味的描写说明在卢前等人心目中，如果胡适等已成为“三代以上的人”，那么在胡适之前的人大概就更无足观。

三

以上说的是卢前为何会作《燃犀》，若从胡适这一方出发，则能看到《燃犀》折射的是国民大革命后新的情势与胡适个人命运的碰撞。对1920年代末的胡适，我们至今仍稍稍忽视，当国民大革命带来又一次“易代”之后，他一方面因政治理念不同经常与国民党政府发生冲突，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言论攻击，甚至有被“法办”之虞。但另一方面他也面对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质疑。这股从各个方面“攻胡”的潮流早在1920年代中期已经开启，而“易代”则打开了洪水涌出的闸门。小说《燃犀》正是洪水中一波典型的浪潮。

从小说内容看，卢前对于胡适乃至胡适周边人物的著作、文章、掌故、轶事、传闻、谣言等都非常熟悉，涉及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各个版本的《尝试集》《冬夜》《草儿》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、胡适的婚姻状况、胡适的朋友、胡适的学生辈、婚姻之外的男女关系，关于新诗的各场争论等等。这些著作、文章、掌故、轶事、传闻、谣言等有的原来是塑造胡适“明星”形象的重要元素，有的虽然是不客气的警评，但也只是在私下言谈、来往书信里如潜流般传递，并未大肆公开传播。但伴随着“易代”的时势大气候变化，这些都成为了可以用来“攻胡”的武器。

比如《燃犀》曾描摹胡识时与郑恒则（影射陈衡哲）交往的情形道：

记得有一天留美同学会开会。在男女毕集，杯盘交错的时候，忽然诸君林君对一位近视眼厚嘴唇的女士指着识时说道：“这何识时兄，郑小姐见过没有？”那位女士正站起来，识时连忙趋前握一握手。郑小姐说：“久仰，久仰，我常在《少年月刊》

（按，影射《新青年》）上拜读大作。”识时逊让了一回，务林道：“何君本来家学渊源，他的……”说着在头搔了几下，好像想了一念，对识时道：“恐怕曾祖……是清朝的经学家哩。”识时得意着，点道头，表示他的话丝毫没有错。务林又指着郑女士道：“这位郑恒则小姐的尊翁也是大诗家哩。”郑小姐笑了一笑，于是识时同他恁在阑干上接谈起来。

……

郑小姐向来是佩服识时的，一见之后，格外亲热，渐渐交情浓密了。不过识时毕竟算得英雄，他在国内早已与一位张东幼女士（按，影射江冬秀）订婚，既订白头之约，不能做忘恩负义的薄幸郎。虽与郑小姐到了爱情的范围，却终不敢及于乱。偶尔想起朋友陈洪俊（按，影射任鸿隽）还没有订过亲来，就想把郑小姐介绍给他，居然不久这个理想实现了。

这一段大概是要点明胡适与陈衡哲之间关系微妙和蔡元培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序言中称胡适“生于世传‘汉学’的绩溪胡氏，禀有‘汉学’的遗传性”的不实。

对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胡适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入手“八事”，小说则极尽讽刺道：

回去是可以回去的了，拿什么去卖出钱来呢？于是盘算多时，才发明了一种主义，叫做九有主义的。何以叫九有主义呢？什么言有序，言有物，什么有病呻吟，什么有新意，什么有俗字俗句纵好，什么有散句而不骈，什么有白句而不典……东扯西拉的把些旧话凑了九点，重新装点出来，果不其然成为了簇簇新的动人新主义。又把他一位碧眼黄须的老师的学说——“实用论”借作自己文学理论的基础。

……

他经过好多时光的预备，已经有头衔可以吓人，有主义可以哄人，有著作可以骗人；一定可以有名誉，有地位，有利益的；再有学生，有妻有子，三三如九将来必定实现“九有主义”了，决定下主意，一帆风顺便匆匆地回到久别的祖国了。

还有对于胡适作《新婚杂诗》情形的大想象。要知道在1921年左右，人们对于胡适婚姻的印象是“独秀曾力劝我离婚，甚至拍桌骂我，而我终不肯”，七年后至少部分人的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《燃犀》着力刻画的不是胡适对旧妻的“不离不弃”，而是胡适对此段婚姻的无奈进入和在婚姻中遭遇的尴尬场景：

罢，罢，这订下十年还没有娶的老婆，还是快一点讨回来罢，算了命，择了日子，赶快地预备起来。时光过得非常之快，

转瞬却到了十二月三十的吉期。把他们俩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，于今完结了。这是多么开心的事！还有一件小小而有趣的事呢，就是他娶亲这天所放的爆竹，还是十年前他老妈要替他娶的时候所办的。他本人逃婚之后，已是镀过金，喝过洋水回来，而老妈已死，爆竹不免又陈旧了些！

听了旧爆竹的声音，（何识时）不免动了新诗之兴。于是洞房花烛夜，提起笔来，作了几首新婚诗，虽然满心得意，其中却发了不少牢骚。诗中有些妙句是：

什么“多少兴亡，不堪回想！”

什么“换了几朝帝王，看了多少兴亡！”

更妙的是：

“老了你和人儿一双！”

“十年陈爆竹：越陈越响！”

“百句一晚得，哈成笑呵呵！”识时笑嘻嘻地连忙把诗稿送给夫人评阅。夫人看了似乎不大高兴的样子，抵了一下嘴，说道：“哼！我真是老了！”识时正想听她的夸奖，谁知反得罪了她，赶快地解释，总算把这一段小风波结束。

如果说以上这些都还有些“薄据”，那么关于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以下简称《哲学史》），《燃犀》则造出了全新的坊间谈资。它说道：

（何）识时一壁听来校长的话，一壁心里想着。这时听他说到哲学史不由有些恐惧而且惭愧起来。何以故？因为根本那本东西是用日本人的著作做蓝本的，说不到著作；何况只有半部，仅仅把周秦诸子敷衍说了，汉以后的，连自己都一点不大了解。这怎么办？那赵普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我这半部讲义怎么支持！还是猫猫虎虎的接着编完了，还是……心中渐渐烦躁起来，听器官也失掉了效力，只见大家手不断的拍着，来校长（按，影射蔡元培）业已讲完，程主袖（按，影射陈独秀）、田元重（按，影射钱玄同）也先后登过了台，眼望着就轮到自己，连忙定一定神，心上不禁大吃一惊。镇住一切的脚踏之想，急急地预备演讲稿，这个关系非轻，与招牌大有关系呢。

这种《哲学史》参考日人著作的话以笔者阅读范围在1928年前似未见，但随着《哲学史》下册的久不见付梓，传言大概正在私底下暗暗流传（同时在坊间流传的还有《哲学史》实际抄袭自胡适祖父）。而《燃犀》让其浮出了水面，并且传播将愈演愈烈！两个多月后胡适因揭露“伦敦赛球会”假新闻一事遭人匿名攻击，利用的也是这一传言，而且直接将“哲学史”对日人著作的参考升级为了对日人著作的抄袭：

你在十年前由美归国，路过日本，在旧书摊上，偶然买到一本日人所著的《支那古代哲学史》，就译成《中国哲学史上》，作为你自己的作品。大家因为你是个西洋学生，都被你蒙住了，盲从赞好。你的书就风行一时。真所谓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。但你究竟乌龟现了原形，十年来该书下册竟不能出版一字。

正因《燃犀》是如此写法，所以在胡适眼中这部小说大概正是——“态度实在不好，风格实在不高”。到1929年7月大概是见多了此类“态度不好，风格不高”的东西，胡适为此做过一总结云：

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，只足以养成一种卑劣的心理习惯；凡足以侮辱反对党的，便不必考问证据，不必揣度情理，皆信以为真，皆乐为宣传。更下一步，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……此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，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。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，万不可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。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，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，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。

这番话提示了一个颇让人省思的问题。清末以来一面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从“形影相依”到“终成陌路”，一面是政治运作中的恶风气不断地在影响各界包括学界。政教的不能“相维”与政教以如此方式“相维”大概正是我们读了《燃犀》这样的小说后可长思之处。

四

目前的胡适研究当然不乏江勇振先生说的“胡适说过就算主义”。但这样说未免打击面过宽，并有矫枉过正之嫌。胡适研究的出发点仍在他本身的材料，关键在如何去用和怎样去读这些材料。本文即建基于胡适日记中包罗的大量剪报和信件，这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史料仓库。但要充分利用这些剪报和信件则需要努力重建其历史语境：胡适何以要在日记中收入这篇文章和信札，其对手方为谁？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章有哪些？能否勾连起信札的你来与我往。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做一些考证源头、报刊重检，来往信函比照的基本工作，这样大概才可能在某一点，进而在一个较大的面上将胡适和其相关人物的研究推向深入。

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历史系副教授。本文获得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项目资助）